

# 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

顧衛民\*

位於上海西南的徐家匯是晚明相國徐文定公光啟的故鄉，其子孫世居其地，且此地處肇家濱和法華涇兩條小河的匯合之處，因而得名徐家匯。

在明末清初之際，天主教已經傳入了上海及江南地區，特別由於在明廷中身居要職的徐光啟及其家族的奉教，使得以後上海及江南的天主教雖歷經嚴酷的禁教時期，仍綿延不絕。近代以後，天主教在新的歷史背景之下以更大的規模展開其傳教活動，重來江南的耶穌會士選擇了徐家匯作為傳教的中心，以此為據點，四出江南城鄉廣泛佈道。由於該地位處要衝，又毗鄰租界，為宣教事業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天主教會在此營建了教堂、學校、育嬰堂、會所、神學院、圖書館、博物院、天文臺、印刷所和報館等等宗教和文化設施，從事種種宗教和文化活動，延續了明末清初先驅者們的未竟之業，徐家匯因而也就成為中國矚目的天主教文化中心。



徐光啟墓（20世紀初照片）

\* 顧衛民，1961年12月出生於上海市，1987年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著作有《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基督宗教傳華全史圖集》（1995年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會編年歷史》（2000年上海書店）等多種學術專著，同時還撰寫有〈廣州通商制度與鴉片戰爭〉、〈評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等四十餘篇學術論文，曾先後赴意大利羅馬大學、特蘭托大學、米蘭聖心大學和英國阿伯丁大學、愛丁堡大學以及臺灣輔仁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訪問。

## 徐光啟與上海開放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高祖竹軒時，其家從姑蘇遷往上海。曾祖徐珣時，家道中落。祖父徐緒，棄農為商，家道逐漸殷富。到光啟之父徐思誠時，商業之茂盛，十倍於前，但卻在1553-1557年受到自海上入侵江南的倭寇的劫掠，徐家婦孺一度逃難，房屋田產被“焚燬殆盡”<sup>(1)</sup>；其父思誠則留在城裡，持械抵禦倭寇。

自明晚期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及運河兩岸的織布業極其發達，“十室之內必有一機”，“比閭紡織為業，機聲札札，日夜不休”，江南竹枝詞有“賣不盡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紗”之句。光啟的祖母尹氏和母親錢氏“早暮紡績，寒暑不輟”<sup>(2)</sup>，有時母子對坐時，錢氏一手抽紗，一手搖紡車，口中對光啟講述倭寇的故事。<sup>(3)</sup>



1581年（萬曆九年）徐光啟中金山衛秀才，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舉順天鄉試第一，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時年已四十二歲。光啟與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初次接觸在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當時他設館於趙鳳宇家，並隨趙氏南下廣西潯州，路過韶州時，在護城河邊的一所小教堂裡遇見了義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 1560-1639），時利瑪竇已往南昌，徐氏

“與郭子晤，頗愜恰”；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光啟赴北京禮部受試，路過南京。當時，他已從文士趙可懷、吳中明處看見利瑪竇刊刻的〈坤輿萬國全圖〉，“乃知有利先生”。光啟特地到城裡拜訪了正在南京傳教的利瑪竇，他與利瑪竇作了細心的長談，聽利氏講解人生的終極和天地的主宰，“為低徊久之，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之君



徐光啟墓及（上圖）守護墓園的石馬



子”。因為要北上應試，他沒有久留，便匆匆上路了。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徐光啟再到南京，往訪利瑪竇未遇，“入堂宇，睹聖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潛學”<sup>(4)</sup>。時利瑪竇已赴北京傳教，留在南京主持教務的耶穌會士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 1566-1623）接待了徐光啟，贈給光啟一冊利氏所著的《天主實義》與另一冊《天主十誡》。<sup>(5)</sup>光啟當日“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次日，他往見羅如望，請求入教。羅神父驚訝之餘，回說須問道數日。在以後的八天裡，光啟均在教堂“觀教禮、考道義”，卒於1603年1月15日受洗入教，取教名“保祿”（Paulus）。

在以後的歲月裡，徐光啟官至翰林院庶吉士、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要，後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是有明一代奉教大臣中官階最高者，被稱為“天主教會在華的支柱”。他在南京教案中，對傳教士的多方庇護，在〈辯學章疏〉中為天主教懇切的申辯，又與西教士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及《泰西水法》等著作，並奏請朝廷起用西洋火炮抵禦滿清的侵擾，並以此作為引入天主教的契機，終臨之時，特意推薦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 1559-1654）、鄧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羅雅各（Giacomo Rho, 1590-1638）和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四位耶穌會士進入曆局等重大史實，斑斑可考，本文不作贅述，僅引錄耶穌會歷史學家巴篤里所言，以證明徐光啟入教一事在教會人士心目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以及對於天主教在華處境改善的意義：

南京周圍，傳教士的收獲很壞，  
天主乃在別的地方償以豐厚的收成。



徐光啟塑像（上海南市徐氏宗祠）



(上圖) 徐光啟故居九間樓(上海南市)

(中圖) 20世紀初的徐家匯天主堂

可是把別的地方的收成都湊和起來，也比不上南京的一位官人（徐葆樂）的進教。這位官人把自己的才華，用為榮教，用為護教，用為開教。他一個人品德的名聲，超出萬人以上。以上他的名字，將常留為中國教會史上的光榮。<sup>(6)</sup>

徐光啟受洗入教以後最關心的事情之一是在他的家鄉上海開教。1607年，徐父在北京逝世。光啟按天主教的禮儀為父舉喪以後，扶柩南歸。他出南京時，即邀郭居靜神父到上海開教。1608年冬天，郭氏從南京起程前往上海，徐光啟已在上海妥為準備，他“派家中的總管去陪伴郭居靜神父乘船來”，“還送去一大筆錢支付旅行的費用”，又“乘自己的船在半途迎迓”。<sup>(7)</sup>光啟先迎郭神父去了南門喬家濱南岸九間樓自己家中住了三天，隨後遷往南門外他的別墅雙園。<sup>(8)</sup>在這段時間裡，光啟每天往見郭神父，並輪番邀請親友聽神父講解教義。在兩個月內，已有五十人領洗入教。光啟本人亦率全家參與受洗儀典，並衣袂朝服，自輔彌撒祭禮。在以後的兩年裡，郭居靜又為二百餘人施洗。1609年12月24日，是上海天主教史上的第一個聖誕夜。入夜時分，徐光啟和所有教徒在新落成的教堂裡舉行彌撒。郭神父當眾誦唸晨課，並做了三臺彌撒，並講解與每一臺彌撒相應的道理。以後當徐光啟北上京師時，仍對上海的教務和郭神父等關懷備至。

1633年，徐光啟逝世於北京。崇禎帝聞喪，輟朝一日，追贈少保，謚文定，並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康並喪行祭，又因光啟“蓋棺之日，囊無餘資”，朝廷特差官賜白金表巨燭帛香油白米柴炭，以行喪事，再遣行人張元始護柩回上海。次年，遺體運回上海，暫厝於南門雙園，直到1641年，才遷葬於徐家匯肇嘉濱北原。在遷葬的第一天，在上海傳教多年的意大利耶穌會士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親率教友一百四十餘人，身穿喪服，手持白燭，抬十字架於雙園光啟靈柩前；次日，又到雙園，排除執紼，扶送靈柩至徐家匯墓地；第三

◀ 19世紀的土山灣印書館





天，舉行追思大禮祝聖墓穴。<sup>(9)</sup>主持追思大禮的潘國光是第一個長駐上海的耶穌會士，他奠定了天主教會的上海基業。1639年潘氏在其助手賈誼睦（Hieronymus de Gravina）協助下，受洗者已有一千一百餘人，1640年又有一千二百四十人受洗。潘氏的傳教活動受到徐氏家族的大力資助，光啟的第二個孫女助其購得城內安仁里北（今南市區梧桐路）的世春堂，潘國光命名它為“敬一堂”<sup>(10)</sup>。光啟的第二個孫女（教名甘第大）對潘國光更是多方協助，曾一次給潘氏銀兩五千五百兩，分送各地二十五名教士，還資助營造松江的教堂。1680年，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 1624-1692）在以拉丁文撰寫的《中國奉教夫人許甘第大傳》統計甘第大在本鄉營造教堂三十五座，它省九座，還刊印一百三十種天主教書籍，並創辦一棄嬰教養院。柏神父稱：“在全國恐無一聖堂，一祈禱所、教區，一善會，不會霑夫人之恩。”<sup>(11)</sup>

徐光啟墓座落在徐家匯土山灣西北，南向，面對肇嘉瀆，墓之原碑已失。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重修，又於墓前置大石十字架一座，屋傍誌刻立碑緣起，四周圍以鐵欄，墓前豎有石人石馬，華表牌坊，石坊正中額曰：“文武無〔雙？〕”，右曰“熙朝元輔”，左曰“王佐儒宗”，正中額下題曰“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贈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闕”，坊聯曰：“治曆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十字碑上有馬相伯所撰碑文。<sup>(12)</sup>

### 近代天主教東傳江南地區

從1724年雍正帝頒佈禁教令到1844年中法〈黃埔四條約〉對天主教的弛禁，其間經歷了一百二十年。天主教在此時期處於非法的狀態。江南地區在明末以來一直是傳教士活動的重要區域。“禮儀之爭”以及後來禁教令的頒佈雖然不在上海，但對上海地區的天主教同樣有重大影響。康熙皇帝於1684、1689和1699年三度巡視江南，那時“禮儀之爭”還沒有激化，康熙對江南的教會優禮有加，諭

令巡幸期間對進香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但是“禮儀之爭”白熱化及雍正帝即位以後，朝廷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724年，曾長期主持上海教務的葡籍傳教士孟由義（Emmanuel Mendez）和李若瑟（Joseph Peóreira）被流放廣州，1725年首次在崇明島開教的法籍耶穌會士彭加德（Claude Jaquemin）被逐出該島，1726年傳教士秉多（Emmanuel Pinto）在松江附近被逮捕，押住廣州。<sup>(13)</sup>和全國各地一樣，上海各處的教堂，或被充公，或改糧倉，或改為廟宇或祠堂，徐光啟老家的由潘國光命名的“敬一堂”竟被改為關帝廟。

歷雍、乾、嘉、道四朝，雖然禁止傳習天主教的程度鬆緊不一，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嚴。在那個時代，天主教雖歷經嚴酷的教難，但並沒有禁絕。美國教會歷史學家賴德烈對此亦甚感詫異：“奇怪的是，不在於天主教遭到了迫害，而在於它竟然被允許存在下來。”<sup>(14)</sup>禁教時期江南教區信徒的社會成份，大部份是種稻田的貧苦農民，以及以船為家的漁民。江南地區河港縱橫，以捕魚為業的漁民甚多，他們以船為家，生活毫無保障，備極艱辛。從1724年禁教頒佈到1824年解禁，江南地區的教友們一直在一種稱為“堂口”的聚會點活動，這往往是一間廳堂，設有祭壇、帷幔、几桌，立有十字苦像或聖母像，小堂一旁即為神父住屋，呈橫形，故又有“橫堂”之稱，這種組織形式後來發展成為上海天主教會的本堂教區。教友們在“堂口”進行秘密宗教活動，外籍教士為躲避官府的追捕，行柙更為詭秘無定。

1840年，傳教士們不顧官府的追捕和迫害，曾聽了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個神工（告解），其中一萬零三百二十一個是四規神工，行了五百七十件婚配，送了一千零二十八次終傅。<sup>(15)</sup>

直到19世紀30年代，江南地區的傳教事業才有了初步的改觀。1832年4月25日，北京的教友給歐洲耶穌會會長羅當（T. R. P. Rootham）上書，敦請耶穌會派遣如明末耶穌會士那樣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建築師等來中國傳教。

1833年聖神降臨瞻禮日，北京教友再度上書羅





#### ◀ 徐家匯天主堂穹頂

馬教宗額我略十六世，此次上書由北京遣使會主教華學源 (Mgr Pires Pereira) 和清朝奉教宗室伯爾明祥都具名，他們申明請求派耶穌士再度來華的原因是：“因為在平民和士大夫之間，在皇帝朝廷之中，耶穌會的聲譽受到特別的尊敬，甚至認為一位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士比帝國官員和學者要強得多。”<sup>(16)</sup> 耶穌會的傳教事業會在明末清初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尤其在文人和官吏中博得了相當的信任。但是，正當“禮儀之爭”清朝和教廷的對峙日益尖銳，在歐洲的耶穌會總部又因為種種原因於1775年奉教廷之命解散，這無疑是給本來已是岌岌可危的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雪上添霜，1814年，耶穌會在歐洲復會，這一訊息或許透過從澳門潛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的傳遞，為中國的教友獲悉，因而有兩度不同尋常的上書之舉。

1838年末或1839年初，羅馬教廷傳信部派遣從澳門潛入湖廣的義大利聖家書院傳教士羅伯濟 (Mgr de Besi, 亦名羅類思) 來到江南，那時江南的教友誤以為耶穌會士重來中國，歡欣鼓舞，奔走相告。1840年羅馬教廷授命羅伯濟為山東代牧兼管江南教務，其所轄之區有魯、蘇、皖、豫四省。與此同

時，傳信部要求耶穌會總會長羅當派遣數名教士協助羅伯濟的工作。羅當奉命派遣了南格祿 (Claudius Gotteland)、艾方濟 (Franciscus Esteve) 和李秀芳 (Benjaminus Brueyre) 三位神父來華。他們之來遠東，受到法國王后瑪利亞·阿美利的資助，她批示這些傳教士乘坐法國軍艦來遠東，提供口糧和其他一切所需之物，並資助從巴黎到布勒斯特港的路費。<sup>(17)</sup> 他們乘坐的法國軍艦抵達澳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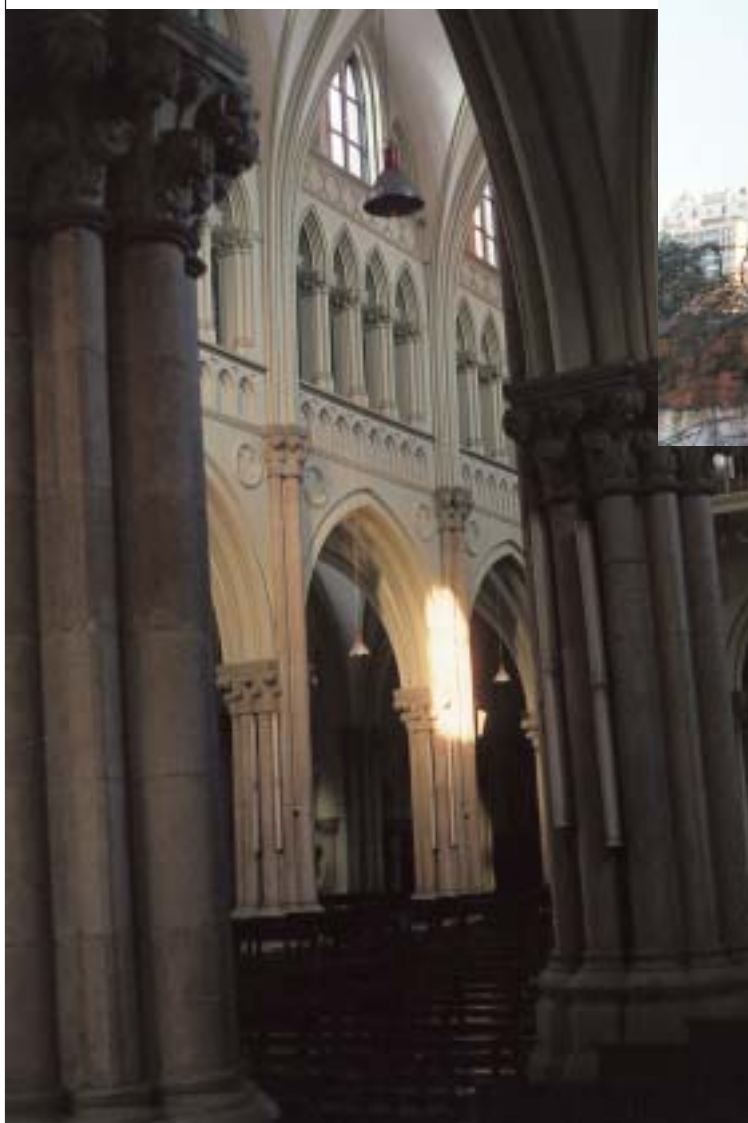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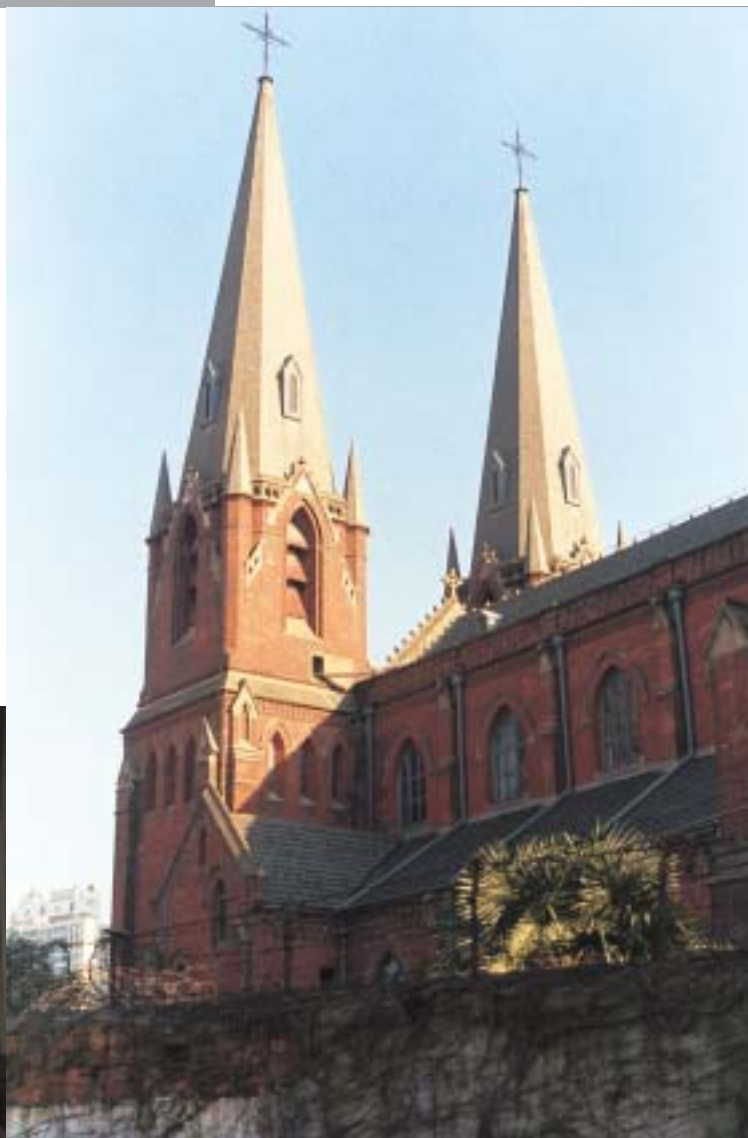
#### ◀ 徐家匯原天主教拯亡女修會遺址



## ▶ 徐家匯天主堂外觀

後，當時正直中英鴉片戰爭，他們又改乘英國的軍艦於1842年7月抵達上海，由當地的教徒接應前往松江的張樸橋居住。1844年10月第二批法國傳教士五人隨法國專使拉蓴尼乘坐軍艦來到上海，1846年5月和8月，第三批耶穌會士八人、第四批四人抵達上海。他們的到來，掀起了近代江南傳教史新的一頁。

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情勢和天主教會的外部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1840至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以滿清的失敗而告終。繼〈南京條約〉以後，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在第二十二款規定了外人可以在五口營造教堂。<sup>(18)</sup> 1844年底，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弛禁



天主教。次年二月，道光帝不但准允弛禁，而且同意歸還雍正和嘉慶以來沒收充公的教堂舊址。那時，在上海的法國耶穌會士和全國各地的傳教士一樣，對於滿清政府態度的變化甚感欣慰。南格祿寫道：“若干傳教士則要求刺蓴尼公使向皇帝要求傳教士有進入帝國內地的自由，並要求將皇諭在各地公佈，……至少我們希望公使的努力能逐漸見諸成效；而且對天主教弛禁的上諭宣佈將能摧毀中國人頭腦裡的許多偏見”。二、法國耶穌會士本想循明末清初來華的先驅者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先驅者的足跡，北上京師，在士大夫階級中傳教。按總會長本來的意旨，艾方濟和李秀芳兩位神

## ◀ 徐家匯天主堂內景



◀ 現徐匯中學大樓大門

接傳教，其工作的對象是上層階級中的官吏和文士，傳教士們認為這是“比較有效的，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方法”<sup>(19)</sup>。但是，時過境遷，當時北京及周圍地區已為法國“遣使會”（Lazarists, The Congregation of Priest of the Mission）所佔據。遣使會在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75年耶穌會在歐洲被解散之時，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74-1792）命令耶穌會將北京的教產移交遣使會管轄，最初來華的遣使會士羅旋閣（Raux）、翼若望（Chislain）、巴保祿（Paris）於1785年抵京，供職於北京的欽天監和國子監算學館，1791-1800年，又有十名會士來華，直到1803年，北京仍有遣使會士逗留，以後雖然北京的外籍傳教士越來越少，但習慣上人們已將北京和直隸省視為遣使會的傳教區域，甚為著名的法國遣使會士，北京宗座代牧區代牧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於1834至1835年從澳門出發，其目的地就是北京地區。所以，當南格祿等抵達澳門後研習了中國的情勢，就決定放棄北上京師的傳教計劃，以上海為中心擴展其教務活動。

### 近代耶穌會營建徐家匯成為傳教中心

父被指定專門從事純粹的宗教傳播工作，而分會長南格祿神父，則將努力設法進入北京，重操利、湯、南氏的舊業，以從事科學研究和教育工作來間

1847年，耶穌會中國區會長南格祿神父決定在“偉大的閣老徐光啟的出生地”徐家匯營建耶穌會修院。原先當第一批傳教士來滬時，修院設在青浦橫塘，因那裡地勢低下，空氣潮濕，教士多患肺痰，所以南格祿決定將修院遷到徐家匯，據他自己說，創辦徐家匯中心會院的目的，一是“表示耶穌會神父們對大宰相徐光啟這位教會支柱的緬懷”，二是因為



◀ 20世紀初徐匯公學原貌





(上) 徐匯公學（現徐匯中學）大樓      (下) 徐匯公學立面外牆





（上圖）1924年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召開的中國天主教第一次全國主教會議確立了教會本地化的方針

“其地正靠近肇嘉瀆，去上海和松江的交通都很便利”<sup>(20)</sup>。

梅得爾(Mathurin Lemaltre)神父是營造會所的負責人。1847年3月，耶穌會在徐家匯買了一塊地皮，開始了建築的工程。同時，常熟的一位劉姓教友捐了一筆哀矜，用來償付地價和購置新會院的設備，向北又營造了一棟房屋。1860年，在肇嘉瀆東面又開拓新址，建成西式的高大樓房兩座，內分三部份：1) 神父的居室；2) 大學院，

專授會中修士哲學和神學以及文學，哲學以三年、神學以四年畢業，畢業後晉陞鐸品；3) 初學院，以二年為修學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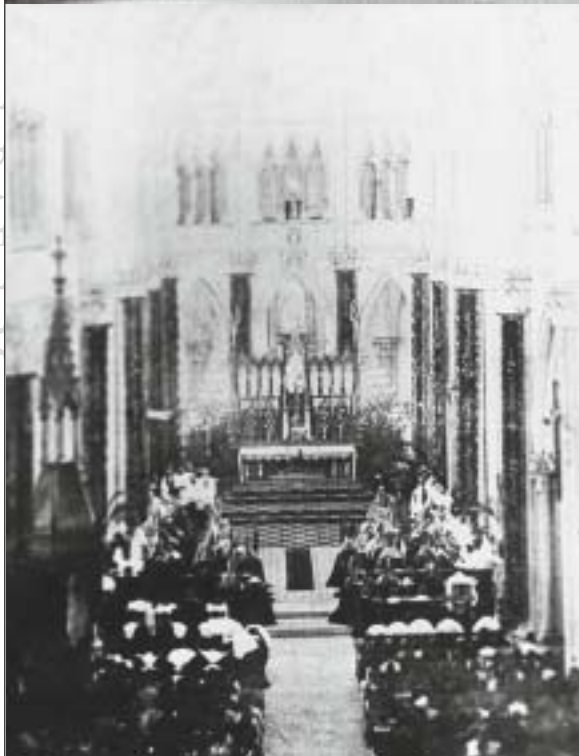
除耶穌會中心會院以外，還建立了大小修道院：一、大修院：創立於1843年2月，由李秀芳神父創立，最初建立於松江之張樸橋，奉聖母聖心為主保，因名“母心修院”，那一年7月遷往橫塘，1850年遷往張家樓，1853年又遷往董家渡，1872年從董家渡遷到徐家匯，兩年後又復回董家渡，1878年再來徐家匯。<sup>(21)</sup>院址設在徐匯公學的老頭門內。直到1928年，在土山灣北面另建成了四層西式洋房，1929年10月告成，它的正東面是南京區主教公署及神哲班教師住院。大修院專授修生，哲學以二年、神學以四年畢業。李秀芳神父最早設立的拉丁文課程是修生的必修課。1852年，兼任院長南格祿講授聖教歷史，從意大利來的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講授神學。他調任徐匯公學校長以後，由貝萊德(Plet)接替。讀書修士利庸樂(Adinolfi)教授哲學，馬理師(Massa)教授拉丁文法，中文教師也由一人增至三人。又規定：1) 修生陞鐸須滿三十歲；2) 凡在讀國文時已習初級

拉丁文者，須再習高等拉丁文兩年；3) 已先攻讀二年或三年者，入院後須再攻讀六至八年；4) 在習拉丁文後，國文仍不廢置。<sup>(22)</sup>

二、小修院：最初與大修院合併一處，1853年大修院遷往董家渡時，小修院仍留張家樓，曾並入徐匯公

（中圖）1933年紀念徐光啟誕辰400週年時徐家匯天主堂舉行追思彌撒

（下圖）20世紀初的徐家匯  
遠處可見徐家匯教堂





(上) 徐家匯耶穌會藏書館遺址 (下) 原啟明女校校址



學，後又從公學分出，遷往董家渡大修院一旁。1860年將上級班拉丁生併入大修院，下級班又併入徐匯公學。1878年大修院遷徐家匯，舊舍即為小修院上下級班居住，1901年小修院遷往徐家匯與大修院合併一處。1913年再次分開，遷往老天文臺房屋，並在天文臺之南擴建會院。1918年新院落成，東西長六十二米，南北寬十二米，設有氣樓，祭臺上供“耶穌聖心像”，故小修院又稱“主心修院”<sup>(23)</sup>。

從1851年開始，天主教江南教區實行了修士歇夏和避靜制度，每年在1月或6-7月，教區內的傳教士分兩批集中到徐家匯。

在此期間，“每天都要聚會討論，每週一次或兩次討論告解聖事中的疑難問題，每週幾次在一個老學究的帶領之下實習中國的官話，……每天下午又要研四書五經一小時……”這種制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推廣到全國各教區。

徐家匯還設有幾所女修



近代著名畫家及雕塑家張充仁所繪之馬相伯油畫像

院：一、聖衣院，創自1869年，舊址在王家堂，1873年另建新院於土山灣慈雲橋東，次年落成。該會宗旨是專以修身克己祈禱為本，是天主教女修會中最高級的修會。會規很嚴：每年陽曆九月十五日次年耶穌復活瞻禮日止，謹守嚴齋，粗衣糲食，寡慾清心，白天有工作時，有祈禱時，即午夜亦必起身祈禱；二、聖母院，創自1855年，原址在青浦橫塘，1864年遷往王家堂，1869年再遷到徐家匯，內分：1) 拯亡女修院，1867年由江南主教郎懷仁(Adrien Languillat)從法國邀請來華傳教。拯亡會的會規模做耶穌會，

有“女耶穌會”之稱。該院從事女子教育，開辦女校，教授刺繡花邊等美工，兼營育嬰堂事務。1929年，因會院燬於大火，重建了一幢四層屋宇，於1931年落成，佔地九十畝，與耶穌會會院不相上下，是上海天主教最大的女性教會機構。<sup>(24)</sup> 2) 獻堂會女修會，1856年創立清浦橫塘，1864年遷



《匯報》和《益聞館》報頭

往王家堂，1869年再遷到徐家匯，正式成立該會。獻堂會的修女主要工作是聯絡教友，做女校的教習，分管育嬰堂的事務，向要求入教者講解教理等等。3) 聖母院育嬰堂：1969年開辦，起初將嬰兒托給徐家匯及其附近的“奶媽”撫養，每月一次抱到育嬰堂檢查身體，發工資和嬰兒的衣袂。1871年，逐漸設置小毛頭間，大毛頭間、小班、大班，分別收容吃奶的、斷奶至二三歲的，十三歲以下的和以上的女孩，大班實為孤兒院。<sup>(25)</sup>4) 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衣廠等，女工共有五、六百人，都是育嬰堂中長大的孤女和徐家匯附近的女教友。

除了男女各類修道院和會所以外，徐家匯地區最引人注目的宗教建築就是教堂。

1846年，南格祿從橫塘遷到徐家匯居住時，他從奉教的徐氏後裔處購置了一小塊土地，營建了會士的居所和一所小堂，此為徐家匯教堂之始。隨舛教務的開展，營造一座與會院相稱的教堂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1851年初，耶穌會命輔理修士范廷佐 (Jean Ferrer) 負責設計圖樣。范氏來自西班牙，其父是雕刻家，他本人曾在羅馬學習藝術，後立志來華傳道，1847年抵江南。他在3月設計完畢以後即動工興建，至7月已完工，舉行了盛大的開堂典禮。這座堂奉聖·依納爵 (St. Ignatius) 為主保，被稱為老堂。建築風格屬希臘式，兩旁配上了中國式的宮燈，顯得十分秀麗典雅。<sup>(26)</sup>

19世紀50-60年代以後，伴隨舛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束，滿清統治集團一部份洋務人士體認到西洋軍事工業的優越性，決意學辦新式的企業，並擢用包括西方傳教士在內的西方人士參與自強運動。雖然內地的教案依然頻仍不絕，但上海的教務卻平穩發展。1856年3月29日，羅馬教廷傳信部諭令撤銷南京教區，建立江南宗座代牧區，第一任代牧是1847年來滬的法國耶穌會士年文思 (Andreas Borniet)，江南宗座代牧區的建立，和建自1690年的南京教區的撤銷，表明葡萄牙在華保教權的結束和法國對保教權的擁有。此一宗座代牧區由耶穌會巴黎教區管轄，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耶穌會士稱之為“江南傳教區”。70年代以後，教區事務由郎懷仁主教

主持。1882年，徐家匯的天主教徒在傳教士的率領下，從聖·依納爵堂出發，跨出教堂四周的牆垣直到近郊，舉行了一次聖體遊行，隊伍以十字苦像開路，後有各式旌旗擁簇，以及身舛紅衣袍和短白衣輔祭孩童隨後，四名秀才高舉華蓋，還有裝飾秀麗的聖體臺，大批教友紛至沓來，四鄉觀眾兩旁排列，場面肅穆壯觀。此時天主教已大大不同於禁教時期，確立了在江南傳教的合法性。<sup>(27)</sup>

到了19世紀末葉，隨舛徐家匯信徒人數的增加和耶穌會事務的擴大，神父們決定營建一座新堂。1896年，徐光啟的奉教後裔奉獻了一部份土地，另一位陸姓教友也捐贈了一塊地皮，開始了籌建工作，但直到1904年正式動工，一個名叫陶特瓦爾 (W. Dodwall) 的外國設計師繪製圖樣，上海建築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mpany) 承擔了建築工程，經過六年的艱辛施工，方告落成。1910年10月22日，新教堂舉行祝聖典禮。新堂為歐洲中世紀哥特式建築，鐘樓高達十七丈，堂脊高八丈，闊九丈，深二十五丈，可容二千五百人同時舉行禮拜，堂內大小樑柱六十四根，採用金山石精刻疊成，設祭壇十九屋，裝飾有許多聖像和壁畫，雄偉肅穆，至今仍為徐家匯的主要標誌之一。<sup>(28)</sup>

## 西方文化東傳的橋樑

鴉片戰爭以後來到江南的天主教傳教士大多數是耶穌會士，他們承襲了明末清初耶穌會的知識傳教政策，企望在傳播教義之餘，以西方的學術和科技知識為媒介，影響和感化中國的上層社會接受天主教，繼而通過上層社會的表率作用，自上而下引導一般民眾接受基督教。祇是在19世紀，他們從事的文化傳教事業的地點，已不是原先的北京，而移到了上海的徐家匯地區。由此，徐家匯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茲分教育事業、科學事業、文字出版事業三部份予以敘述。

### 一、教育事業

徐國公學是徐家匯地區最早的教育學校，也是上海最早的教會學校。它創立於1850年，當時江南

發生大饑荒，徐家匯附近的居民中無力贍養子女的人，將子弟送到了附近的天主堂，傳教士將他們收養以後成立了徐匯公學。<sup>(29)</sup> 1852年，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10）任校長。這位於1848年來中國的傳教士是著名的漢學家和教育家，根據他於1857年的報告，公學有八十二名住宿生，分住三院，有九名中國教師，都不是教徒，主要教授中文課程，祇有優秀的學生才能學習其他如法文、唱歌、音樂和圖書等課程。<sup>(30)</sup> 1859年，為了培養未來的神聖人員，開始設立拉丁文課程，到19世紀末，法文成為正式的課程；到20世紀初，除中文以後，可選擇英文或法文任何一種學習，程度較高者以英語或法語教授算學、物理、地理與歷史等科。<sup>(31)</sup> 到1910年，開始用中文面向全體學生開設上述課程。在1875年，徐匯公學已經有了九十名住宿生和數百名走讀生，那時，入學者多半是貧苦人家的子弟，因為富裕的縉紳家庭都聘請塾師，寄宿學校不符合中國的習俗，因此這個數字已相當可觀。1875年，法文《中國通訊》的一位編輯曾這樣描繪徐匯公學學生們一天的生活：學生們用震耳的聲音朗誦古代的儒經，每個學生反復大聲讀唱從未有入給他們講解過的課文，學生還在老師面前背書，背書時頭搖來搖去。書法課極受重視，因為書法的好壞是衡量才學的標準。學齡最高的學生還要上作文課，學作八股文章。這表明，學校在傳授西學的同時，也注重中學，其教學方法也是傳統式的。然而，這裡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學校有一個樂隊，用的是從法國運來的樂器，他們常常演奏晨曲（彌撒曲）。有位來滬的法國男爵親身聆聽了樂隊的演奏。他寫道：“指揮者鼻子上架一付大眼鏡，手執小小的指揮棒，他指揮，激動，而許多青年演奏者雙目盯住樂譜，滿頭大汗，終於較好地演奏出了一名音樂大師最美妙的交響曲——海頓的名曲竟在中國，而且由中國人演奏了。”<sup>(32)</sup>

徐匯公學最初祇有三層的房屋。1873年，校舍有所擴大，到1878年再次擴建。1917年1月8日，另一所更大的新校舍舉行祝聖奠基儀式，1908年6月20日落成，新校舍連同教師宿舍樓、一個可踢足球的

大操場和兩個小操場。1920年建校70週年時，有學生446人。最初建校的時代，學校的宗教氣氛比較濃厚，設有小教堂，宗教課程稱為“聖學課”，為必修課程。信教學生中的住宿生，每天早上須望彌撒，午、晚膳時讀聖書，睡前合誦晚課經。1866年，隨法國遠征軍艦隊抵上海的一位畫家絮貝爾（Henri Zuber）在訪問徐匯公學後寫道：“無庸諱言，對他們進行的教育中，教理問答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們受到神父們熱情的照顧。”校長晁德蒞神父曾明確表達過徐匯公學的教育方針：“進入修道院並非為了謀求別處不能謀求的職位，而是相反，是要犧牲早已獲得的穩妥地位。為了教區的前途，物色徵募神職人員，最重要的是必須從熱心傳教和忠心服務兩方面去考慮。對於教育我們的青年，我們已有相當多的經驗，保證會有足夠數字的聖召，更何況他們的動機祇是榮主救靈，而沒有其他目的。”<sup>(33)</sup> 不過，到了20世紀以後，隨天主教中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徐匯公學也將培養教外子弟作為重要的辦學目標，其章程第四條規定：“本校第二宗旨亦為培植教外學生，使得確當之教育，純粹之品行，造成真實愛國之人材”，並表示“毫不強迫教外學生入堂行禮，即有學生自願參與教中典禮，亦須先得義兄之許可，以期實行信教之自由”。<sup>(34)</sup>

除了徐匯公學以外，還較早開創了女子教育事業，建有1) 崇德女校，這是一個附屬於聖母院的機構，1869年王家堂的聖母院遷徐家匯以後即建有一所女校，專收院內的孤女，1898年取名崇德女校，有自己的屋宇、場地、花園和菜園，後來富家女孩子亦入校學習，設有中、外文和美術課程。1912年改為中學，聖母院常從學校中招受信徒。<sup>(35)</sup> 2) 啟明女校：崇德女校的學生均為教友家庭成員，為了招收教外的學生，拯亡會於1904年創辦了啟明女校，校長為原先的務本女校校長吳懷疚，震旦大學校長李問漁神父代擬學校章程，並定名啟明，教授中外文課程、西洋音樂與歌唱、繪畫和體操。1906年學生增至五十名，次年舉行頒獎典禮，授與優秀者以文憑。1916年學生增至160人，次年擴建校舍並落成，1921年學生入人數激增至270餘人，這是一所



非常成功的女校。20世紀以後，徐家匯還有另外兩所男子學校：1) 徐匯師範：1920年由曾任《聖教雜誌》主編的潘秋麓神父發起，校址在新舊天文臺之間，1925年，因學生日眾，於博物院南面建立新校舍，學業定為三年，另加教育實習一年，第四年終舉行畢業考試，組織各委員會嘗試編寫各類教材，學生考試及格者給予結業證書，服務於教育界。<sup>(36)</sup> 2) 類思小學：1914年成立，校址設在老天文臺，專收附近普通學生，學校取四二制，分初、高級，畢業後昇入徐匯公學或徐匯師範。

## 二、科學事業

明末清初耶穌會的先輩們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人曾經向中國介紹西洋的輿地學和天文學，為在中國獲取立足之地的晉身之階。近代的耶穌會士沒有忘卻這一歷史的經驗，徐家匯的傳教士曾明確指出在徐光啟故鄉創辦科學研究機構的意義：“憶及過去老天文臺曾為中華帝國的宣傳福音事業起過很大的作用，立過很大的功勳，激勵人們希望利用科學來傳教，以便引起中國學者的尊敬與信任，引導他們歸向耶穌基督；……用自然科學的研究來愈顯天主的光榮，拯救人們的靈魂，為宗教事業服務，這是創辦科學機構的真正目的。”早在19世紀60年代，郎懷仁主教就決定創辦一個科學機構。1872年8月，在郎懷仁主教的主持之下，耶穌會士們在徐家匯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他們成立了“江南科學委員會”，將其工作劃分為四部份：1) 在徐家匯建立一所“與耶穌會相稱”的天文臺，將氣象記錄和觀測所得編成雜誌，在上海出版並寄往歐洲；2) 在韓伯祿 (P. Heude) 神父領導下研究自然科學，在徐家匯珍藏並展覽所收集的標本材料，以此為中心逐步形成一個博物院，並將記錄和論文整理出版；3) 在費賴之 (Aloysius Pfistor, 1833-1889) 神父指導之下研究中國史地，其中包括江南傳教區的歷史情況，收集整理老傳教士的傳記和信件，重印教區常年報告書，確定繪製江南教區的詳細地圖；4) 用中文出版一本講科學和護教的雜誌。徐家匯耶穌會科學工作的中心是建立天文臺和博物院。<sup>(37)</sup>

徐家匯天文臺創設於1872年，其創立者是劉德

耀 (Henri Le Lee) 神父和高龍倍 (Auguste Colombel) 神父，他們都來自法國期通赫斯特天文臺，並從歐洲帶來儀器觀測天象。初建之時，天文臺祇有三廳，西廳分兩間為神父臥室，中廳加一層平面屋頂，儀器祇有從羅馬寄來一架氣象記錄儀，幾支寒暑表和氣壓表，高神父自製了一架簡單實用的測風車。

但到了後來，天文臺有了很大的發展。第一任正式任命的臺長是能恩斯 (Marc Docheverens)，他到任以後立即添買了地磁記錄儀，從事學術的研究。在以後幾任臺長蔡尚質 (Stanislas Chevallier)、勞積勳 (Froc) 和龍相齊 (Cherzi) 的主持之下，日漸擴大，到了20世紀共設有六個部，分設於上海徐家匯及佘山兩處。此六部為：1) 天文研究部設在佘山，配有雙式赤道儀以及各項附件，所擔任的工作是製星表，觀察星體的掩蔽，協助國際月表之重行檢定，確定小行星的軌道以及研究天體力學；2) 地磁研究部，也設於佘山，配有完備的儀器，以確定地磁的主要值以及連續記錄值，研究報告均載入該臺所刊行的地磁雜誌，專載各項特殊研究。該部和世界各天文臺保持聯繫與合作，分擔國際研究項目；3) 大氣物理研究部，該部分為兩處，一處在佘山，一處在徐家匯，備有太陽輻射測量器及記錄器，研究大氣吸收性用的大型雙式分光鏡，以及用於研究大氣臭氧密度用的尋常分光鏡。此外並有游離探測儀器，以及借自巴黎國立氣象局的研究大氣儀器全一套；4) 地震研究部：設於徐家匯，備有地震儀與法國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國際地震局合作，出版有關地震記錄儀器；5) 標準時刻部：設於徐家匯，備有基本擺，以及確定時刻之專用經緯儀等儀器，與巴黎國際標準時刻局保持聯繫，向公眾報告標準時刻；6) 氣象研究部：設於徐家匯，配有氣象局應用的各類儀器，會陸續刊佈關於遠東氣象的主要觀測，研究颶風的原理，以及研究低度游離層與天氣的關係，向公眾預告風暴。<sup>(38)</sup>

第一任臺長能恩斯到職以後，最初將天文臺的職責定為致力於學術研究。1879，上海遭到颶風的襲擊，上海租界工部局連同海關及各航運公司，一



致要求徐家匯天文臺設立專司，擔任海面及揚子江流域的風暴預告。《徐匯記略》記載曰：“該臺專司測候氣象，電告中國沿海長江一帶軍艦及輪船公司，指明颶風驟雨之所在，使航海者免遭不測，中國電報總局及各國電公司，對於傳遞該台之消息，一律免費，且隨至隨送，毫不耽遲，蓋亦好公樂善之美舉也。該臺每日上午九時，下午二時，專以氣候圖表，以及風旗式懸掛於上海外洋涇橋報風塔處，宣示其報時之法午前十一時五十五分，塔上圓球落下，繼而昇至塔頂，十二時正，仍復落下，夜間懸燈四盞，九時四燈，忽然熄滅，以及表記。目下船海家電問氣象時候者，共七十餘處，該臺接此電詢，即繪圖寄至上海報風處張掛，任人抄閱。勞積勳神父對於發生在遠東海面上的颶風頂報工作，成績卓著，有‘颶風神父’之稱。由於他的努力，保全了不少船隻。1921年，法國駐上海總領事以法國總統名義授予勞神父以‘榮譽勳騎尉獎’。1927年，法國公董局又把沿震旦大學原名‘天文臺路’命名為‘勞神父路’。”<sup>(39)</sup>

耶穌會在徐家匯還設有博物院。徐家匯老天主堂原本就有一些標本收藏。1868年1月，法國韓伯祿神父抵達上海，他在徐家匯創立了博物院，專門搜集生物標本，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館。韓氏精通鳥類學、地質學和植物學，尤以研究中國有角動物與油脂動物見長。他在往返於安慶、南京傳教時，收集了許多動物標本，甚至足跡遠抵爪哇和西藏，每次返滬時，他都帶有許多珍奇的標本，以為貯藏，這時博物院收藏有珍禽異獸、水族界，尤以麋鹿為最多，均製成模型。另外，還收藏有日本、菲律賓、安南、暹羅、麻六甲、馬來等地動植物標本，尤以哺乳動物為多，均為韓氏在考察中國周邊國家時所搜集。韓伯祿祖父曾著有《說鹿》一書，經法國教育部於1877年5月批准，定為科學名著，並頒獎章。1903年，由於原來校舍不敷使用，該博物院遷往震旦大學內部，在徐家匯時代，其中文名稱為“徐家匯博物院”，西文稱為“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或“Natural History of Museum”，意謂“自然歷史博物院”，遷往震旦大學以後，中文名

改為“震旦博物院”，西文名為“Musee Heude”，以紀念韓伯祿神父的業績。<sup>(40)</sup>

### 三、文字出版事業

1849年，耶穌會在青浦橫塘創建了一所孤兒院，幾經變遷，於1864年遷到了徐家匯土山灣，是為土山灣孤兒院。不久，耶穌會在孤兒院工場中間設立了一個印刷所，即土山灣印刷所<sup>(41)</sup>，收容年滿十二歲以上兒童學習手藝，製作宗教的用品如彌撒時的祭臺，聖像和雕刻像以及聖爵和聖盤，同時也印刷和重刊清時代耶穌會的舊著。到1869年，它出版的木版中文宗教著作，已經超過了七十種，其中大部份是利瑪竇、湯若望、柏應理、李瑪諾、南懷仁、艾儒略、潘國光、龐迪我等人著作的重版。從1874年開始，土山灣印刷所引進了鉛字。鉛活字的印刷術最早是出生於愛爾蘭的美國新教士姜別利（William Gamble ? - 1886）在上海美華書館（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發明，其方法是紋理細密的黃楊木刻陽文字，鑲入黃銅殼字，雕鏤之工少，又可縮小活字尺寸，文字清晰美觀，稱為“美華體”。<sup>(42)</sup>土山灣引進了這種技術以後，從此便能供應廉價而輕便的漢字書本了。土山灣印刷書館早期出版的有價值的西方著作中有一部意大利耶穌會士晁德蒞所著之鉅著《中國文學課程》（Cursus Litterature Sinicae），這是一部供來華傳教士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書籍，共五期，大凡中國文學作品自幼童三字經到詩、詞、歌賦、八股文、尺牘、楹聯、小說等均予輯錄，1879年出版第一、二冊，1880年出版了第三、四冊，1882年出齊晁氏的另一著作《辣丁文規》（Emmanullis Alvarez Institution Grammatica）也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專供入修道院的修士用。<sup>(43)</sup>晁氏於1848年來華，終身寓居徐家匯，歷任徐家匯公學校長、初學院院長，後來的中國天主教著名人士馬相柏、馬建忠和李問漁，均出其門下。

19世紀末期，在徐家匯從事文學事業的還有中國籍耶穌會士李栻（問漁），他生於1842年，二十七歲時入耶穌會，1872年晉鐸，他是當時少數精通拉丁文和法文的中國神父，1879年3月16日他創辦了





《益聞錄》，該刊自第一至第十號，為雙週刊，自第十號改為每週一次。1898年《益聞錄》與《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匯報》，每週出版科學和新聞類各十六項，訂閱者也從七百人發展到了三千二百人，1907年更名為《時事科學匯報》，次年再更名為《匯報》，主筆一直是李問漁，直到1911年停刊，其間經歷三十二年<sup>(44)</sup>，介紹了許多西方的科學知識，諸如物理學、化學、數學、動物學、植物學、礦學和天文學知識。在那個時代，上海天主教的人數還很少，李問漁主辦的刊物，不得不考慮教外讀者的意見，故有西學知識的介紹與延納。1888年，李問漁還創辦了《聖心報》，這是一份上海天主教內歷史最長的刊物，直到1951年才停刊。主筆李問漁去世以後，繼任者有潘谷聲、丁汝仁、王昌祉和丁宗傑。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匯報》停刊，代替《匯報》的是《聖教雜誌》，1912年1月首期出版，第一任主筆是潘谷聲。1921年潘氏去世，繼任者為徐光啟十二世孫徐宗澤。徐宗澤生於1886年，二十歲時入耶穌會，後赴美研讀文學、哲學及神學，獲哲學神學博士，並晉陞司鐸，1912年回國，先在南匯實習傳教，後任《聖教雜誌》主筆，兼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sup>(45)</sup>20世紀以後，由於信徒人數的擴大，《聖教雜誌》的宗教色彩也日益濃厚，主要刊載關於天主教教義、教規、教儀、教史的專文和教會文獻，教會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主張和觀點，上海和各地天主教會和教徒團體重大活動記略。1938年，因抗戰全面爆發，日寇佔領上海，《聖教雜誌》停刊。

1847年，耶穌會在徐家匯營建了一座藏書樓，分為上下兩層，上層主要貯藏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名貴西文書籍八萬冊。據1993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Shanghai Library Catalog of Western Rare Book)的介紹，上海圖書館目前收藏的西文珍本書籍，相當一部份來自徐家匯天主教藏書樓(Bibliotheca Major Zi-Ka-Wei)，譬如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Juan Gonzalez de Mendoca: Dell' Historia della China, 1586年威尼斯)、衛匡國

《韃靼戰紀》(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1654年安特衛普)、《中國新圖》(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年阿姆斯特丹); 萊布尼茨《中華新事萃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Hictoriu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 1697年); 曾德昭《中華帝國志》(Alvarez Semedo: Imperio de la China, 1642年, 馬德里)、金尼閣《基督教遠征中國記》(Nicolas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Societate Jesu, 奧格斯堡, 1615年); 李明《中國現狀新志》(Louis 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 état present de la China, 巴黎, 1701年)等等<sup>(46)</sup>。下層專藏中文書籍, 有徐宗澤神父從各地搜集而來的省府廳縣志, 有各省名貴碑帖等十二萬冊, 志書二千一面餘種以及各種古幣等文物, 據徐宗澤神父遺著《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明清間教會書目》, 可知該館藏有明清以來耶穌會士和中國教徒所撰的教理和教史著作數百種, 其中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三山論學記》、《聖經直解》、《主經體味》、《彌撒經典》、《主制群微》、《主教緣起》、《超性學要》、《名理探》、《徐氏庖言》等名著。<sup>(47)</sup>

## 結語

在西歐的歷史上，許多城市的興起與天主教會的活動有關。有些城市，比如說羅馬城，其本身的發展與教會的活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宗教的中心。另外一些城市，其市中心往往座落天主教堂，環繞天主教堂的廣場往往形成宗教遊行或者集市活動的中心，並進一步形成以包括教會學校、醫院、印刷廠、報館、修院等建築為特色的社區。在中古的早期或晚期，這類現象屢見不鮮。

像徐家匯這樣一個特殊的天主教社區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年在遠東的上海出現，確是一種特有的現象。首先，它與天主教在近代伴隨西方殖民主義東擴有關。早在元明清時代，天主教傳教士即



在中國活動，然而形成如此之大的規模，卻是近代鴉片戰爭以後的事情。教會在權益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而上海的開埠本身就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天主教會在徐家匯擁有的大量地產，其本身象徵一種權力。徐家匯毗鄰租界，又有徐光啟家族的淵源，很自然地成為傳教士們矚目的地區。其次，自明末以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在溝通中西文化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時至19世紀以後，新來的耶穌會士仍然步武明末先驅者的足跡，在徐家匯創辦了許多教會宗教座建築以外的文化事業，包括教會、學校、印刷所、報館、天文臺、圖書館等等。徐家匯的藏書樓實際上做做的是北京北堂圖書館，天文臺則做做的是湯若望、南懷仁在北京所建的觀象臺，祇不過耶穌會士活動的地點從北京移到了上海。從整體來看，近代天主教文化事業不及新教，但在徐家匯這一特定區域內卻相當發展。在遠東各大天主教活動的城市中，如北京、天津、廣州、澳門、漢城、長崎等，像徐家匯如此具有天主教會以及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社區是罕見的。當時的中國，正處在由中古向近代社會的轉型之中，徐家匯的這些文化設施，向人們展示了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成就，對於當時追求西學的人們來說，無疑具有借鑒的作用。

## 【註】

- (1)(2)(3) 羅光：《徐光啟傳》（臺）傳記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7。
- (4)(5) 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7。
- (6) 羅光：《徐光啟傳》頁15。
- (7)(8)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頁599。
- (9) 羅光：《徐光啟》，頁17。
- (10)(1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頁177。
- (12) 石徑：《徐匯紀略》《聖教雜誌》第19年第9期，1930年9月。
- (13) 高振農：《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4)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 (15) 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一），頁24，19。
- (16)(17)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重印，1991年，頁270。
- (18) 王鐵喆：《中外舊約章匯編》三聯書店，1960年第1卷，頁62。
- (19)(20) 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一）頁77；頁39。
- (21)(22) 石徑：《徐匯紀略》《聖教雜誌》第19年，第8期，1930年。
- (23) 艾寶沃：《拯亡女修會在中國》，《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270-284。
- (24)(25) 石徑：《徐匯紀略》（續）《聖教雜誌》第19年第9期，1930年。
- (26)(27) 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一）頁232。
- (28) 莊索原：〈徐家匯天主教大教堂〉，《歷史文化名城——上海》上海地方史資料（六），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75。觀：高振農：《上海宗教史》頁639-640。
- (29)(30) 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二）頁98。
- (31) 《徐匯公學創立七十週年紀念慶祝志盛》《聖教雜誌》1920年第12期。
- (32) 〈中國通訊——亨利·貝絮爾旅華散紀〉《近代史資料》（北京）1987年11月，頁5。
- (33)(34) 《徐匯公學章程》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資料》1987年北京，頁93。
- (35)(36) 《徐家匯啟明女校25週年紀念》《聖教雜誌》1936年第1期。
- (37) 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下卷，頁209。
- (38) 陳生：〈上海徐家匯天文臺概況〉，《科學世界》第16卷第1期，頁19-20，1946年。
- (39) 〈徐家匯天文臺勞神父之榮譽〉，《聖教雜誌》1930年第10期。
- (40) 上海通誌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上海書店，1937年，頁379-383。
- (41) 顧裕祿：《上海天主教出版概況》；莊索原：〈土山灣印書館瑣記〉《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 (42) G. 麥金托什：〈美國長老會書館（美華書館）記事〉，《出版史料》1984年第4期。
- (4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頁260-262。
- (44) 上海近代報紙，始於1868年新教林樂知創辦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年改為《萬國公報》），其次是1872年的《申報》，《益聞錄》是第三家。
- (45) 王昌祉：〈徐宗澤神父事略〉，《益世周刊》第29卷，第4期。
- (46) 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1993年。
- (47) 徐宗澤：《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明清間教會書目》，《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4、5合刊。